

智能传播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范式变革、核心挑战与路径优化

宋平 徐敬宏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筑国家文化认同的核心，也是智能传播时代阐释中国道路、彰显中华文明特质的重要依托。当前，媒介技术正驱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范式从“传统宣介”向“智能共生”转型，推动传播主体、叙事模式与交互逻辑发生根本性变革。在转型过程中，叙事脱节、算法偏见与文化转译失真等问题日益凸显。为应对这些挑战，本文基于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构建协同治理路径，在物理维度夯实底层技术基座，在事理维度重构算法叙事逻辑，在人理维度完善价值共生生态，旨在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由“单向输出”向“价值共生”深层演进。

[关键词] 中华文化 国际传播 算法治理 路径优化 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

一、问题的提出

《“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2030年）》在“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部署中明确提出，要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创新传播载体与方式，推动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实现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与国际话语权^[1]。在当今数字化场域中，这一战略部署的核心诉求正获得全新的技术内涵，它表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正加速突破传统媒介主导的线性范式，跨越至由智能算法、大数据分析与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深度驱动的“智能传播”全新阶段。在新旧范式交替的剧烈转型期，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已突破了单一的“文化折扣”范畴，演变为算法权力规训与文化深层误读相互交织的系统性风险^[2]。这种风险在实践中呈现出多维嵌套的特征：其一，算法逻辑的异化。数智技术在赋能传播的同时，其底层算法对流量的盲目追逐形成了“算法枷锁”，可能导致文化生态在重构中面临失序与主体性消解的风险^[3]；其二，AIGC的转译失真。尽管AI技术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效率工具，但训练数据集的潜在偏差易引发文化深层的误读与转译失真，加剧话语建构中的情感隔阂；其三，叙事与价值的

脱节。传统“走出去”模式下的叙事内核固化，若缺乏共情机制的有效介入，则难以实现从物理触达到深度跨文化融入的突破^[4]。然而，当前学界与实务界的探讨虽已触及“破圈”之道及游戏等新兴载体的价值取向^[5]，但多囿于单一的技术批判、孤立的个案分析或表层的策略罗列，尚未形成整合技术赋能、内容叙事与传播主体三个维度的系统性理论框架。

为弥补上述研究空白，本文引入物理—事理—人理（Wuli-Shili-Renli, WSR）系统方法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6]。WSR源于中国系统科学对复杂系统问题的研究，强调从物质与技术条件、运行逻辑及主体行为与价值关系的整体联动中理解实践活动，其优势在于揭示多要素非线性耦合条件下的系统演化机理^[7]，与智能传播语境中“技术—规则—价值”高度耦合的现实情境具有天然契合性。物理维度（W）聚焦数智技术底座与算法分发机制，分析算法权力对文化可见性与主体性的结构性影响；事理维度（S）关注传播运行逻辑与叙事机制，探讨智能环境下叙事演化与共情机制的优化路径；人理维度（R）聚焦主体能动性价值认同，通过考察跨文化语境中的话语建构与情感差异，反思智能传播条件下深层文化误读



的生成机理。

本文立足解决复杂问题的 WSR 方法论视域，尝试构建智能传播语境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风险的识别体系，通过解构物理、事理、人理各子系统的内在关联，系统回答传播范式的演变机理、风险挑战的生成逻辑以及治理路径的优化策略。

二、范式之变：从“传统宣介”到“智能共生”的秩序重构

全球传播格局的变化并不仅仅体现在技术维度，而是渗透到主体结构、叙事逻辑、渠道体系以及用户角色等多个层面。胡正荣提出，当前国际传播研究正向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多元范式迈进^[8]。智能传播时代推动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范式，正从以国家与媒体为主体、以线性传播为形式的“传统宣介”模式，逐步迈向以平台算法为基础、以用户参与和智能协同为特征的“智能共生”模式。

（一）主体重构：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共生

在传统范式中，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主体是高度一元化的，由国家媒体主导，构成了传播链条上唯一的、中心化的信源。然而，智能传播赋予了技术和个体空前的“施为力”——即行动者通过介入传播进程以塑造或改变既有秩序的转化能力，这种施为力的释放突破了中心化的主体结构，催生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官方—平台—民间”多元主体共生网络。

一方面，官方角色正从主导转向引导与赋能，其核心作用在于确立传播的宏观基调，并维护内容生态的总体平衡。同时，商业平台凭借算法与流量配置权，已由传播渠道演进为“环境构建者”与“隐性议程设置者”，实质掌握了内容可见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以海外文化博主、AIGC 创作者等为代表的个体传播者，凭借其跨文化转译意识与算法敏感度，正通过生活化的叙事激发全球范围内的情感共鸣。从街头的古筝弹奏与中国舞表演，到对古老手工技艺及其背后“工匠精神”的守望，再到对“一蔬一饭”日常智慧的真切记录，这些叙事将抽象的文明元素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

的视觉景观。通过“去符号化”的叙事策略，普通人的故事得以连接海外受众的本土经验，推动文化认同从外在的“他者凝视”逐渐转向内在的“情感融入”。这些创作者依托社交亲近性与内容适应性，其传播效应既突破了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逻辑，也在算法协同下形成了持续扩散的长尾效应。

此外，以《原神》《黑神话：悟空》为代表的数字文化产品，正在通过商业化、全球化运营，成为国际文化传播的软实力名片。其优质内容和强大的市场运营能力，使得它们的传播效能超越了传统非营利宣传机构。这种多元主体的共生与协同极大地增强了传播的活力和韧性，但也带来了后续话语权协同与生态治理的新挑战。

（二）叙事转向：从宏大叙事到微矩叙事

传统宣介模式多立足于宏大叙事，侧重于国家成就、历史断代或抽象价值观的系统输出，倾向于利用标志性图腾展示文化的厚重感。这种叙事虽具权威性，但在跨文化语境中易产生“博物馆式”的文化疏离感。在智能传播时代，叙事范式则转向了“微矩叙事”，即通过海量具体、情感化的个体故事，解构并重塑国家文化形象。这种叙事方式重点采用“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逻辑，将抽象的文化之道通过微场景与微生活进行涵化演绎与情感赋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非遗技艺的趣味展示等具象形态，有效勾连了海外受众的生活现实与认知经验，实现了从物理触达向情感嵌入的跨越。

微矩叙事通过具象形态的开发与多元主体的介入，有效降低了因意识形态和文化隔阂产生的“共情偏差”。例如，故宫博物院通过故宫文创系列产品，将古老的建筑与文物符号转化为时尚、可感的文创形象，在海外消费市场中实现了文化符号的“降压”与“下沉”。与此同时，通过鼓励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洋网红”等民间主体，利用他者视角的微观叙事与本国语言的差异化解读，增强了中国叙事的可信度与亲和力。这种基于具身经验的叙事，赋予了汉服、茶艺、熊猫等符号更强的生命力，使其在短视频、表情包及游戏场景中被不断激

国际出版
传播

活，实现了从物理触达向情感嵌入的实质性跨越。尽管微矩叙事增强了文化内容的可触达性，但也带来了文化符号浅层化、内涵固化的风险。

（三）渠道革命：从线性广播到算法驱动

传统国际传播模式遵循经典的“内容制作—媒介渠道—大众受众”线性广播逻辑。在这一范式中，信息沿单向物理路径传输，传播效能高度依赖渠道的覆盖广度与物理触达能力。人工编辑作为“守门人”，凭借专业判断决定内容的传播优先级与可见性。

智能传播时代的渠道革命，其核心在于算法完成了对传播权力的系统性重构。权力中枢从传统编辑室转移至算法模型，内容的曝光不再取决于人的专业判断，而取决于算法对用户行为数据（如偏好、停留时长、互动率）的深度预测与实时响应。传播链路由此演变为一个动态、网状、反馈驱动的复杂自适应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内容能否有效触达，不取决于传播者的主观意愿，而取决于其能否成功激活平台的参与度指标（如点赞、评论、完播率）。算法如同一个隐形的“数字筛子”，通过对海量信息的实时过滤与优先级排序，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化符号的全球可见性。这意味着，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必须首先掌握与算法逻辑深度对话的能力，通过形式创新、节奏优化与互动设计，获取进入全球受众视野的“算法入场券”。

这种渠道变革在实践中显著提升了传播的精准度与沉浸感。例如，三星堆博物馆在TikTok上利用短视频与直播，借助算法的“信息找人”机制，成功突破了地域与文化的隔阂，让全球年轻人实现对古蜀文明的跨时空感悟；国风网络游戏的全球盛行，则证明了交互式渠道能让玩家在算法驱动的具身传播中，实现从单向信息吸纳向深层情感认同的转化。综上所述，国际传播的成功逻辑已从依赖渠道的覆盖能力，转向内容对算法规则的适配能力。然而，算法这把决定内容可见性的“钥匙”，在实现精准触达的同时，也可能因其内在的商业逻辑与文化偏见演变为禁锢文化多样性的“枷锁”，这构成了智能传播时代亟待破解的深层挑战。

（四）角色演进：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共创

在传统传播模式中，海外受众通常被视为信息的被动“接收端”乃至文化输出的“目标对象”，其在传播链条中处于单向接受的终端位置。而在智能共生的新范式下，受众角色实现了根本性转变，从被动的接受者演进为具有高度参与性的主动共创者。

这种演进的核心在于受众对内容生产与意义重构的深度介入。受众不再满足于单向的信息消费，而是通过评论互动、模仿挑战、跨语种翻译等多种方式，深度参与内容的再生产与文化代码的再诠释。在此过程中，二次创作本身即构成新的传播内容与渠道。例如，海外读者自发为中国网络小说组建“译站”；全球玩家为《原神》等文化产品创作海量同人作品等。这些行为不仅拓展了原初文本的文化外延，更在参与中重塑并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国际表达图景。这种共创行为要求受众具备数字素养和算法意识，能够主动识别、学习并运用特定的文化符号和数字表达方式。由此形成的参与式文化社群，成为文化认同持续培育和深化的动态场域。

总体而言，从接受到共创的角色演进，显著提升了传播过程的卷入度与情感黏性，推动了文化价值在传播中的共同建构与内化。受众主体已转变为文化传播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阐释者、再创作者与传播节点，是实现从单向输出到“价值共生”质的跃升的关键机制。

三、挑战之困：范式转型期的系统性风险

在智能传播范式的重构过程中，技术、逻辑与主体的失调引发了复杂而相互交织的系统性挑战。这些困境不仅是传统“文化折扣”的数字变体，更是WSR系统中物理、事理与人理三者失序后的集中表现。

（一）物理之困：算法偏见与转译失真

物理维度聚焦智能传播的数字元设施与分发工具。当前，技术底座的内生缺陷与算法权力的扩张，正使中华文化传播陷入“高触达、低转化”的结构性困局。



国际出版 传播	
96	

一方面，算法模型通常基于既有的互联网数据进行训练，其训练集往往带有西方中心主义或既有刻板印象的偏见。这种内嵌的文化偏差在物理层面系统性地影响内容识别和推荐逻辑，使得算法倾向于放大或优先推荐与既有负面认知相契合的内容，削弱了中华文化叙事的多元性与复杂性。“算法枷锁”由此生成，技术在提供效率红利的同时，以隐形的逻辑规训重塑了文化可见性的基本结构。

另一方面，AIGC 技术在成为生产力助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物理层面的转译失真风险，这是对传统“文化折扣”的系统性放大。文化外译应从单纯的“语言转换”跨越至“文化转译”^[9]，然而在当前再媒介化进程中，技术性与文化性的张力往往导致语义断裂与认知错位。中华文化作为强调情境化嵌套的“高语境文化”，在适配 AIGC 碎片化、轻量化的低语境逻辑时，“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等复杂哲学内核极易被剥离为单薄的视觉奇观与猎奇符号，文化内涵在被快速消费的同时遭遇结构性降维。

更为隐蔽的是，个性化推荐算法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持续学习，构筑起稳固的“过滤气泡”，形成坚固的“文化茧房”。对中华文化原本就感兴趣的受众会不断接收到同类信息，形成“回音室”效应；而态度中立乃至潜在感兴趣的广大群体则几乎无法触达。这使得文化传播陷入一种“内卷化”困境——在既有兴趣圈层内部不断精益求精，却难以实现真正破圈与大众化渗透。综合来看，在物理维度上，算法偏见、转译失真与过滤气泡相互叠加，构成范式转型期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所面临的首要结构性风险。

（二）事理之困：叙事脱节与规则异化

在事理维度上，传播运行逻辑与叙事规则未能与智能传播生态同步变革，呈现出“表层迭代、内核固化”的突出矛盾。

一方面，尽管传播的物理渠道已完成智能迭代，但大量内容的叙事内核与表达语态仍深陷传统范式的窠臼，呈现出典型的“叙事脱节”问题。具体表现为，在叙事视角上，仍习惯于将中华文化“他者化”为东方奇观，将之简化为供外部观赏的异域风情；在语言体系上，

难以摆脱结论先行、成就宣示式的宣传腔调，惯用宏大概括而缺乏具身体验与日常细节。这种固化内核与智能媒介生态崇尚的真实性、人格化和平等对话原则产生深刻排异。当平台用户期待的是未经过滤的生活切面与可参与的互动对话时，迎面而来的却是高度提纯的“成就简报”，传播失效便在所难免。叙事与受体期待之间的巨大裂隙，使传播内容在去中心化的智能生态中严重“水土不服”，难以建立有效的情感连接和价值共鸣。

另一方面，算法驱动流量逻辑在事理层面导致了“规则异化”。平台通常以互动率、完播率、争议度等指标作为核心优化目标，优先推荐高情绪强度、高冲突性的内容，文化呈现由此趋于片面化、极端化，甚至被娱乐化、猎奇化。为了获取曝光与流量，一些内容创作者不得不迁就平台规则或迎合低级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化叙事的深度与复杂性，使“按文化逻辑讲故事”逐渐让位于“按平台逻辑讲故事”。总体来看，平台流量逻辑与传统叙事惯性未能形成有效适配，文化传播在追求传播效率的同时，其价值表达和文化深度受到一定挤压，构成了范式转型期的第二重风险。

（三）人理之困：主体生态失序与话语权争夺

在人理维度上，多元主体的介入与权力结构的重组，一方面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生态失序与话语权弱势的现实困境。

从内部生态看，范式转型带来了主体与规则层面的失序。一方面，多元主体的积极发声在带来活力的同时，也造成了声音嘈杂与标准模糊。个别民间博主为博取流量而发布的偏激或不当言论，极易被算法放大，并被西方媒体作为典型个案，进而牵连至国家形象与整体文化叙事，损害中华文化的整体信誉。另一方面，官方机构、商业平台、文化企业、民间创作者与海外受众之间，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协调机制与协同治理网络，多元主体在目标指向、表达方式与风险认知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主体生态因而呈现出“活力提升与秩序失衡并存”的状态。

从外部环境看，以 Twitter、YouTube、Facebook 等为代表的全球性平台，构成了国际舆论传播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这些平台上，中国叙事依然面临结构性的话语权弱势，内容审核、审查机制和议程设置逻辑往往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因此，在出现涉华负面舆情时，中国声音常常陷入被动回应、解释和澄清的“辩护者”困境，主动设置议题、引领舆论走向。这种不对称结构使得中华文化在文明对话中“起点后移”，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应有的解释力与引领力。综合来看，在人理维度上，主体多元下的生态失序与全球平台格局中的话语权弱势叠加存在，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在范式转型期面临第三重，也是最具结构性张力的风险领域。

四、破局之策：基于 WSR 的“物理—事理—人理”协同治理框架

面对前述三个维度上的系统性挑战，零散、单一维度的优化难以奏效，必须采用与之相匹配的系统性治理方案。WSR 系统方法论以其“懂物理、明事理、通人理”的整体性思维，为构建这一方案提供了顶层的哲学指引与行动框架。在本研究中，物理（W）维度主要对应算法偏见、AIGC 转译失真与过滤气泡等技术结构性风险；事理（S）维度主要回应叙事脱节与规则异化问题；人理（R）维度则聚焦主体生态失序与话语权弱势困境。因此，破局之策也需在 W、S、R 三个层面上分别提出针对性的路径，并通过三者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由“单向输出”向“价值共生”的深刻转型。

（一）物理（W）层路径：夯实智能基础设施

针对物理维度中揭示的算法枷锁、数据偏见、AIGC 转译失真与过滤气泡等风险，物理层治理的核心在于通过工具迭代、平台赋能与基建自主三条路径，重塑技术底座的文化友好性与可控性。

1. 打造中华文明垂直模型与开源母体
从根源上破解文化转译失真难题，需推动

AIGC 工具从浅层语言翻译向深层文化转译、技术底座与中华文明内核深度对齐的系统性能力跃迁。下一代人工智能工具，不仅要实现语言符号的精准转换，更要具备深层文化认知、语境共情与价值理解能力。首先，构建自主可控的“中华文明垂直大模型”。由国家级文化机构、高校与头部科技企业协同，整合中华典籍、历史档案与非遗要素，建设多模态知识库，在技术底层完成文化语境对齐，使 AI 生成内容时能准确理解“和合共生”“天人合一”等高语境哲学内涵，从源头纠正西方中心主义的刻板偏见。同时，将该大模型及轻量化算法面向全球开源，打造去中心化的中华文化数字叙事母体，为海外独立开发者、青年创作者提供一键调用的高精度国风视觉、文本、音频资产，大幅降低中华文化二次创作与国际传播的技术门槛。

在此过程中，人机协同机制是确保文化转译质量的核心保障。应始终强调“人作为最终价值把关者”的主体地位，通过构建高效的人机交互界面，使具备专业素养的传播者能够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精准修正、语境校准与价值注入。这一协同机制既充分发挥 AI 在效率与规模上的优势，又确保文化内容在适应平台传播规律的同时，不丧失其精神内核与身份真实性，最终实现从技术辅助到智慧共生的范式跃升。

2. 赋能本土数字平台与算法审计

在智能传播的底层逻辑中，基础设施的对外依赖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制约文化传播安全性与话语自主性的核心症结。面对西方以“清洁网络”为名的市场准入限制与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的数字传播生态，已成为保障文化主权的战略必然。

在平台侧，培育雁阵式数字平台集群。借鉴中国数字贸易的实践经验，持续壮大市值超 10 亿美元的本土平台，形成“领军企业突破、细分行业冠军跟进”的雁阵布局^[10]。依托我国在短视频、移动支付、社交商务等领域的先发优势，深耕全球 Z 世代市场，将“算法驱动、用户生成、数据高效利用”的商业模型转化为文化传播载体。通过本土化运作与全球化



	布局的融合，这些平台将不仅是商业中介，更是承载中华文化元素的数字空间，将推动实现文化影响力与市场份额的同步发展。 然而，鉴于算法运作的隐蔽性，仅靠市场运作不足以确保传播正义。必须引入专业智库等第三方机构开展文化公平性审计，监测隐性限流、标签误判等歧视性行为，倒逼海外平台公开算法决策逻辑。这不仅是为中华文化争取平等的传播权利，更是构筑算法治理、维护数字主权的最后一道防线。 3. 布局自主安全可控的数字主权 要真正掌握国际传播的战略主动权，就必须跳出“借船出海”的被动依赖思维，转向“造船出海、自主领航”的主动布局，从技术底层构建安全可控、自主高效的国际传播技术生态。这既是适应全球数字治理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需要，也是保障中华文化长期稳定出海、实现可持续传播的战略基石。 首先，推动本土优势平台积极参与全球化发展，推动其构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兼具中华文化立场的数字伦理与内容生态，完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与内容安全机制，不断提升在全球数字空间的规则制定权与议题设置权。其次，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主动探索区块链、Web3.0 等新兴技术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应用场景与落地路径。这类技术所具备的去中心化特性、内容可溯源优势，恰好能破解当前文化传播中存在的版权保护薄弱、内容真实性难以核验等痛点。更为关键的是，通过为优质文化内容赋予不可篡改的“数字身份证”，能够在信息鱼龙混杂的国际舆论场中，牢牢守住文化叙事的真实性底线，有效抵御虚假信息的干扰与误导。 这种技术层面的前瞻性布局，不仅能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更安全、高效的技术支撑，更能在下一代全球传播技术格局中抢占先机，为文化传播的长期战略主动权奠定坚实基础。 （二）事理（S）层路径：创新叙事运行法则 对应事理维度中揭示的叙事脱节、内核固化与流量驱动的规则异化问题，事理层路径的	关键在于通过叙事现代化、叙事微观化与叙事共创化三条路径，重构与智能传播生态相适应的运行法则。 1. 传统话语的现代化与全球阐释 破解文化“内核固化”困境的关键，在于为传统符号注入当代意义与全球对话能力，推动中华文化摆脱“历史遗存”“东方奇观”的刻板标签，将传统智慧转化为回应人类共同议题的资源^[11]。 一方面，实现核心价值的普世化转译。将“和合共生”“天人合一”等传统智慧，与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伦理、公共卫生等全球共性议题建立创造性关联，完成从民族叙事到人类共同价值的升维。例如 2024 年现象级游戏《黑神话：悟空》，以 3A 级制作将《西游记》中的因果哲思与善恶张力转化为全球玩家可感知的互动体验，上线首月全球销量突破 2000 万份——证明传统 IP 经过现代化转译，完全具备跨文化穿透力。另一方面，强化价值观的场景化表达，将抽象价值嵌入可感知的实践场景中。例如，将“天人合一”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结合，将中国绿色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实践诠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象实践，或让故宫文创承载可持续发展内涵、中国高铁故事传递“科技创新造福人类”的价值，使传统文化符号在新情境中焕发生命力，有效降低文化折扣。 2. 微观生活肌理的场景化唤醒 面对算法偏好碎片化内容、国际舆论易被宏大叙事偏见主导的现实，真实感、烟火气、个体经验成为跨文化破圈的核心支点。为此，应建立常态化扶持机制，通过专项基金、流量扶持、创作者社群赋能等方式，培育更多“自下而上”的个体创作者，以真实生活、日常肌理、朴素情感为素材，立体呈现中国社会的多样性、人文温度与时代活力。例如李子柒，在 YouTube 积累 1400 万订阅者，被国外网友称为“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视频中几乎不出现文字说明，却让大量海外观众主动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叹。相较于刻意设计的宣传片，源于个体经验的生活化表达更具情感穿透力与可信度，能够有效消解意识形态对立、破
国际出版 传播		
98		

除西方媒体建构的刻板印象与标签化认知，成为柔性传播的关键载体。

3. 空间计算赋能的价值网络共创

叙事共创化的核心是打破“我说你听”的线性单向传播，转向全球参与、双向对话、共同创作的智能传播新范式。一是发起全球性主题共创行动，依托“Discover China”等品牌挑战赛，邀请海外创作者围绕中国元素进行再创作，或与国际艺术家联合开发文化产品，引导受众深度参与翻译、二创、背景考证等环节，使单向“讲述”转变为双向“共创”。二是前瞻性布局空间计算与具身智能场景，推动传播范式从“超文本”向沉浸式“超界面”跃迁。借助具身智能技术，在数字空间打造具备自主互动能力的拟人化“文明化身”，依据海外用户的文化背景与语态实现个性化情感联结；将微矩叙事嵌入混合现实设备，让受众以“第一视角”走进非遗工坊、国风虚拟世界等文化场景。以莫高窟为例，用户佩戴VR设备，从北凉第275窟的雄浑苍劲，到西魏第249窟的灵秀飘逸，千年壁画在眼前逐层展开。叙事法则由此从线性的“看故事”升维为交互性的“身体参与”，受众在具身体验中完成从信息吸纳到文化认同的深层内化。

（三）人理（R）层路径：营造健康传播生态

针对上文在人理维度中指出的主体多元形势下生态失序与全球平台格局中话语权弱势问题，人理层治理的重点在于通过治理网络化、力量战略化与评估体系化，重塑多主体协同与价值共生的传播生态。

1. 打破体制壁垒的网状协同治理

推进国际传播能力现代化，必须打破体制内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传统格局，构建全域联动、高效协同、资源最优配置的网络化治理体系，推动顶层设计与海外终端传播同频共振、一体执行。

在这一模式下，应打造“国家队引领、民间队突破、平台方支撑”的混编协同力量，官方机构作为“战略大脑”进行顶层布局，主流媒体发挥专业传播优势，同时将主体范围从政府部门扩展至社会组织及广大民众，激发全民

参与的传播活力，从而使文化传播有效覆盖政治、经济、娱乐等全场景，并深耕对外建设的全流程。此外，通过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与海外自主传播基地的建设，畅通与国际知名媒体的合作渠道，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制作与品牌共建，推动中国故事和声音实现“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最终打造具有国际溢出效应的媒体品牌，形成系统有序、运行有效的中华文化传播全链条。

2. 全球视野国际传播人才战略化

构建自主可信的中国话语与叙事体系，核心支撑是专业化、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梯队。在实践层面，应致力于打造一批充分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精通多种语言且具备深厚在地化表达能力的专业化人才队伍，通过创新培养模式，使传播者既能合理运用理论知识提供指导，又能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语言习惯形成精准、有针对性的叙事风格。通过培育具备全球视野的决策团队与高效执行力的传播人才，有力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同时，系统性地识别并赋能具有跨文化魅力的关键意见领袖，使其成为“可信、可亲、可敬”的中国故事讲述者，以“文化使者”的人格力量穿透文化壁垒，构建起跨文明认同的情感桥梁，从而在人才储备与力量整合的双重维度下，夯实战略传播体系不断优化升级的关键要素。

3. 多维量化评估与动态风险预警

为从“人理”层面科学检验传播的最终效果与潜在风险，必须超越以浏览量、点赞数为代表的粗放式“曝光指标”，构建一套智能化的综合评估与预警体系。首先，应建立融合多级指标的综合评估模型。该模型需突破传统流量数据的局限，系统整合“触达率、参与度、情感倾向、认知改变、行为意向”等多维指标，实现对文化认同度与价值传递效果的深度度量，真实反映传播活动在认知、态度与行为层面的综合影响。其次，必须构建基于AI与大数据的动态风险预警机制。通过实时监测与分析全球舆情态势，系统能够对潜在的文化误读、叙事冲突与舆论风险进行早期识别与预警，为策略的动态优化与危机的快速响应提供



数据支撑，从而扭转被动应对的“辩护者”困境，实现从经验驱动到数据智能驱动的决策升级。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物理—事理—人理（WSR）方法论，系统解构了智能传播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内在机理，揭示了传播范式正经历从传统宣介向“智能共生”的深层变革。研究发现，文化出海已由早期依托海外渠道的“借船出海”，进阶为自主建设数字元设施的“造船航海”，并最终指向多主体协同治理的“舰队协航”。在这一进程中，平台算法已演化为重塑传播关系与文化价值分配的核心系统。面对“算法枷锁”与“转译失真”等复杂系统性风险，单一维度的技术改良或叙事优化已难以为继。必须依托物理层（技术底座）、事理层（运行逻辑）与人理层（价值引领）的深度耦合，通过夯实自主基建、重构微观叙事与完善协同网络，推动中华文化传播由单向输出向价值共生的整体性转型。

展望未来，智能技术的非线性迭代将持续重塑全球文化格局。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战略核心应从被动适配技术变革，转向主动塑造算法规则并引领全球文明对话。后续研究需进一步关注 Web3.0 与通用人工智能（AGI）带来的结构性机遇，持续迭代 WSR 治理模型，将传播平台深度嵌入全球数字文明交流网络。在多维交互的数字生态场域中，通过提升传播的认知透明度，有效对冲结构性误读与“文化折扣”效应，最终在数智文明的深度交融中，构建起协同共生、互鉴互塑的全球传播新秩序。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人民日报, 2026-03-14 (01).

[2] 王学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文明逻辑、战略考量与创新路径. 中国编辑, 2025 (9): 18-24.

[3] 刘进旭, 石红梅. 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生态重构及其风险治理.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5 (11): 68-81.

[4] 吴飞. 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 (5): 59-76.

[5] 徐海. 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破圈”之道. 新闻世界, 2025 (12): 3-5.

[6] 顾基发, 唐锡晋. 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 理论与应用.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6: 15-16.

[7] 顾基发. 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的实践. 管理学报, 2011 (3): 317-322.

[8] 胡正荣, 熊昊轩. 2024 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主要特征与未来展望. 国际传播, 2025 (1): 7-19.

[9] 高振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外译与国际传播路径创新研究.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5 (33): 156-159.

[10] 张军军. 数字化赋能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创新实践与优化路径. 国际传播, 2024 (2): 51-58.

[11] 白晓晴, 卜欣荣. 人工智能驱动下中华文化的对外话语逻辑与传播策略重构研究.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2025 (3): 72-84.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吴婷]

国际出版
传播